

论语 孟子 老子 庄子 韩非子 管子 墨
子 孙子兵法 孙臆兵法 吴子 尉繚子 鬼
谷子 晏子春秋 列子 吕氏春秋 商君书

盐铁论

慎子 尹文子 公孙龙子 人物志 淮南子
论衡 潜夫论 风俗通义 荀子 山海经 搜
神记 博物志 世说新语 抱朴子 内篇
传习录 近思录 梦溪笔谈

时代文艺出版社



文白对照全译诸子百家集成

盐
铁
论

西汉·桓宽

时代文艺出版社

目 录

导 读	(1)
本议第一	(5)
力耕第二	(9)
通有第三	(12)
错币第四	(16)
禁耕第五	(19)
复古第六	(21)
非鞅第七	(24)
晁错第八	(30)
刺权第九	(32)
刺复第十	(36)
论儒第十一	(41)
忧边第十二	(45)
园池第十三	(48)
轻重第十四	(51)
未通第十五	(55)
地广第十六	(60)
贫富第十七	(64)
毁学第十八	(66)
褒贤第十九	(70)
相刺第二十	(73)
殊路第二十一	(77)
讼贤第二十二	(80)
遵道第二十三	(82)
论诽第二十四	(84)
孝养第二十五	(87)
刺议第二十六	(90)

利议第二十七	(91)
国疾第二十八	(94)
散不足第二十九	(98)
救匱第三十	(108)
箴石第三十一	(110)
除狄第三十二	(111)
疾贪第三十三	(112)
后刑第三十四	(114)
授时第三十五	(115)
水旱第三十六	(117)
崇礼第三十七	(121)
备胡第三十八	(123)
执务第三十九	(127)
能言第四十	(129)
取下第四十一	(130)
击之第四十二	(133)
结和第四十三	(135)
诛秦第四十四	(138)
伐功第四十五	(140)
西域第四十六	(142)
世务第四十七	(144)
和亲第四十八	(147)
繇役第四十九	(149)
险固第五十	(152)
论勇第五十一	(156)
论功第五十二	(160)
论邹第五十三	(165)
论灾第五十四	(167)
刑德第五十五	(173)
申韩第五十六	(179)
周秦第五十七	(184)
诏圣第五十八	(189)
大论第五十九	(195)
杂论第六十	(199)

导 读

《盐铁论》是汉代的一部记述盐铁会议的重要典籍。桓宽著。

桓宽（生卒年不详），字次公，汝南（郡治在今河南上蔡西南）人，致力于《公羊》、《春秋》，学问渊博，善写文章，在汉宣帝（公元前73—前49在位）时举为郎，官至庐江太守丞。

《盐铁论》是桓宽根据盐铁会议的记录而写成的。早在汉武帝（前140—前87在位）时，西汉朝廷为了消弱地方割据势力，增加财政收入，抗击匈奴贵族的攻掠，巩固中央政权，曾经实行盐铁官营、平准、均输以及统一币制等一系列重大财政经济政策，并收到政治、经济效果；但同时也与下层地主阶级和中小商人的利益发生矛盾，同时也给人民生活带来困难。于是在昭帝始元六年（前81）二月，朝廷以“问民间所疾苦”为由，召集各地推荐的贤良、文学60余人到都城长安举行会议，就盐铁官营等政策与这些政策的主要制订、执行者御史大夫桑弘羊及其僚属进行辩论，是为著名的盐铁会议。双方以盐铁官营等政策是否应当继续执行为主题兼论其他经济、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各方面问题，在会议上进行了激烈的论争。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第1次规模较大的关于国家大政方针的辩论会。会议结果，废除了全国酒类专卖和关内铁官。到宣帝时，桓宽根据盐铁会议的官方记录，加以“推衍”整理，增广条目，写成《盐铁论》一书。前面部分是写会议上的正式辩论，后面部分是写会议后的余谈，最后一篇《杂论》是作者写的后序。篇各标目，前后联成一气，采用对话文体，以生动的语言真实地反映了当时辩论的情景，充分反映了双方各自在经济、政治和对外关系等各方面所持的不同观点和立场。其主要内容为：

在经济领域，桑弘羊和文学贤良的争论，集中在一系列重大的经济政策上，也是会议的核心内容。文学贤良认为，实行盐铁官营、酒榷和平准均输是政府在“与民争利”，违背了“贵德而贱利，重义而轻财”的古训，败坏了社会风气，使百姓“背义而趋利”，以致“就本者寡，趋末者众”。在本与末的关系上，文学贤良认为，“末盛则本亏，末修则民淫，本修则民愿，民愿则财用

足，民侈则饥寒生”，主张“进本退末，广利农业”（以上均自《本议》）。指出：“安民富国之道，在于反本，本立而道生”（《忧边》）。他们反对国家干预经济，认为那会产生“攘公法，申私利”的弊病，主张“利禄不兼”。而桑弘羊则极力主张盐铁官营、酒榷以及平准均输，认为政府采取的这些经济措施都是“万民所戴仰而取给者，罢之，不便也”（《本议》）。为此，首先提出的一条便是筹措抗匈战费，因为要屯戍备边，用度不足，“故兴盐铁，设酒榷，置均输，蕃货长财，以佐助边费”（《本议》）。如果废之，势必“内空府库之藏，外乏执备之用，使备塞乘城之士，饥寒于边”。其他如“建本抑末，离朋党，禁淫侈，绝并兼之路”（《复古》），所有这一切，也无不仰赖这些政策的贯彻执行。桑弘羊主张国家积极干预经济，认为盐铁官营是国家应具有的一种经济政策，认为一个国家要集中政治权力，就必须相应地集中财权，而盐、铁、山泽之利，是国家的巨大物资财富，乃“霸王之资也”（《刺权》），“人君统而守之则强，不禁则亡”。桑弘羊接受了范蠡、白圭的重商思想和《管子》中有关国家经营工商业的思想，认为工商业在人民经济生活中必不可少，主张“开本末之途，通有无之用”（《本议》），“农商交易，以利本末”（《通有》）。但认为工商业应由政府控制，发展官营工商业。此外，关于消费概念，桑弘羊承继了《管子》侈靡的消费观，反对崇俭的消费观。

在政治领域，桑弘羊继承先秦法家的“法治”观，认为“令严则民德，法设而奸禁，罔疏则兽失，法疏则罪漏，罪漏则民放佚而轻犯禁，故禁不必，法夫侥幸”（《刑德》），肯定法律和刑罚对治理国家的作用。文学贤良则认为：“道径众，人不知所由；法令众，民不知所辟”（《刑德》），“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杀人而不能使人仁”（《申韩》）。鉴于当时“民犯禁滋多”的情况，也承认国家有使用“刑罚”的必要性，但应先教后罚，决不可不教而诛。

在对外关系方面，桑弘羊和文学贤良论战的焦点是如何对待匈奴的入侵问题。文学贤良从儒家“和为贵”的观点出发，主张对匈奴“加之以德，施之以惠”（《忧边》），继续采取亲和妥协政策。反对汉武帝的抗匈政策，认为与其劳民伤财，进行无益的战争，还不如伤财而不劳民，“偃兵休士，厚币结合，亲修文德”（《击之》）。而桑弘羊则认为以“德”立国并不足以拒强敌于国境之外，靠妥协苟安，结果是“身以放迁，宗庙绝祀”（《诛秦》）。汉武帝“睹其可以武折而不可以德怀”（《结和》），方才“广将帅，招奋击”，决心讨伐匈奴。他赞扬汉武帝“功勋粲然，著于海内，藏于纪府”（《结和》）。

《盐铁论》全面地记录了盐铁会议上桑弘羊与文学贤良双方的言论，为后世保留了西汉中叶丰富的经济思想和政治哲学思想史料，尤为可贵的是它把桑弘羊这一封建社会杰出的理财家、政治家的概略生平、思想和言论相当完整地

保留了下来，成为研究中国思想史，特别是经济思想史和桑弘羊思想的一部极为重要的著作。其价值，自古就为知识分子所肯定，将它列入学者经世济民之道必读之书，更公认是子书中的巨著，历代著作者多有记载和引用。

本议第一

惟始元六年，有诏书使丞相、御史与所举贤良、文学语，问民间所疾苦。

文学对曰：窃闻治人之道，防淫佚之原，广道德之端，抑末利而开仁义，毋示以利，然后教化可兴，而风俗可移也。今郡国有盐、铁、酒榷、均输，与民争利。散敦厚之朴，成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趋末者众。夫文繁则质衰，末盛则本方。末修则民淫，本修则民恇。民恇则财用足，民侈则饥寒生。愿罢盐铁、酒榷、均输，所以进本退末，广利农业，便也。

大夫曰：匈奴背叛不臣，数为寇暴于边鄙。备之则劳中国之士；不备则侵盗不止。先帝哀边人之久患，苦为虏所系获也，故修障塞，饬烽燧，屯戍以备之。边用度不足，故兴盐、铁，设酒榷，置均输，蕃货长财，以佐助边费。今议者欲罢之，内空府库之藏，外乏执备之用，使备塞乘城之士，饥寒于边，将何以贍之？罢

始元六年，发布诏书，让丞相、御史大夫和由各地所举荐的贤良、文学进行讨论，询问民间感到困苦的事情。

文学回答说：“我们听说，治理人民的方法，应是阻断享乐放纵的根源，发扬道德因素，抑制工商业而宣扬仁义，不用财利去引导人民。这样做了以后，教化便可以振兴，风俗便可以转变。如今在全国各地实行盐铁官营、酒类专卖和均输法，与人民争利，破坏了敦厚朴实的风俗，造成了贪婪鄙陋的习气。因此百姓从事农业的人少，热衷工商业的人多。外表华丽，内质就会衰败，工商业兴盛，家业就受到损害。国家发展工商业，人民就腐化；国家发展农业，人民就诚朴。人民诚朴，财物就会充足；人民奢侈，饥寒就会产生。希望废除盐铁官营、酒类专卖和均输法，以便巩固根本而抑制末梢，大力发展农业，这样做是有利的。”

大夫说：“匈奴背叛汉朝而不肯臣服，屡次侵略边境。进行防备，就会使中原的兵士劳累；不防备，匈奴的进犯抢劫就不会停止。先帝哀怜边疆人民长期遭受祸患，苦于被匈奴人所俘获，因此在边疆建筑城堡，修整烽火台，驻军来进行防守。因边防费用不足，所以实行盐铁官营、酒类专卖和均输法，增加国家的财富，以补助边防费用。如今你们要废除这些政策，在内将造成国库空虚，在外将造成军费缺乏，假使守卫要塞城堡的士兵在边疆遭受饥寒，用什么去供应他们呢？

之，不便也。

文学曰：孔子曰：“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故天子不言多少，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丧。富仁义以风之，广德行以怀之。是以近者亲附而远者悦服。故善克者不战，善战者不师，善师者不阵。修之于庙堂，而折冲还师。王者行仁政，无敌于天下，恶用费哉？

大夫曰：匈奴桀黠，擅恣入塞，犯历中国，杀伐郡县朔方都尉，甚悖逆不轨，宜诛讨之日久矣。陛下垂大惠，哀元元之未贍，不忍暴士大夫于原野。纵难被坚执锐，有北面复匈奴之志，又欲罢盐、铁、均输，扰边用，损武略，无忧边之心，于其义未便也。

文学曰：古者贵以德而贱用兵。孔子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今废道德而任兵革，兴师而伐之，屯戍而备之，募兵露师以支久长，转输粮食无已，使边境之士饥寒于外，百姓劳苦于内。立盐、铁，始张利官以给之，非长策也。故以罢之为便也。

大夫曰：古之立国家者，开本末之途，通有无之用。市

废除这些政策是不利的。”

文学说：“孔子说：‘诸侯、大夫不担心财富少而担心财富不均，不担心人民少而担心人民不安。’因此天子不谈论多少，诸侯不谈论利害，大夫不谈论得失，而是蓄积仁义来进行教化，推广德行来进行安抚。于是，近处的人前来归附，远处的人心悦诚服。因此，善于克敌的人不必去作战，善于作战的人不必去用兵，善于用兵的人不必去布列军阵。只要朝廷修明国政，就可以制服敌人而使他们退兵。圣明的君主推行仁政，就可以无敌于天下，为什么要用军费呢？”

大夫说：“匈奴人凶猛狡猾，擅自放肆地闯入边塞，侵犯内地，杀害朔方都尉等郡县官员，十分悖逆无礼，早就应当予以惩处和讨伐了。陛下广施恩惠，既哀怜百姓生活困苦，也不忍心让士人和官吏暴露在原野。纵然朝廷派兵披甲持枪，有到北方反击匈奴的决心，而你们却又要废除盐铁官营和均输法，担心边防费用过多，破坏讨伐匈奴的战略，没有忧虑边疆安危的心思，这在道理上是不妥当的。”

文学说：“古代的君主崇尚德治而轻视用武。孔子说：‘远方的人不归附，就用仁义礼乐吸引他们。他们到了以后，就使他们安定下来。’如今放弃仁义道德而依靠武力，出兵进行讨伐，驻兵进行防备，长期地使用军队，粮食运输无止无休，使边疆士卒在外饥寒，使百姓在内感到劳苦。有了盐铁官营，才设置谋利的官吏来供应边防费用，这不是好的办法。因此，废除它是有利的。”

大夫说：“古代建立国家的人，开辟发展农业和工商业的道路，使物资互通有无。市

朝以一其求，致士民，聚万货，农商工师各得所欲，交易而退。《易》曰：“通其变，使民不倦。”故工不出，则农用乏；商不出，则宝货绝。农用乏，则谷不殖；宝货绝，则财用匮。故盐、铁、均输，所以通委财而调缓急。罢之，不便也。

文学曰：夫导民以德，则民归厚；示民以利，则民俗薄。俗薄则背义而趋利，趋利则百姓交于道而接于市。《老子》曰：“贫困若有余。非多财也，嗜欲众而民躁也。”是以王者崇本退末，以礼义防民欲，实菽粟货财。市，商不通无用之物，工不作无用之器。故商所以通郁滞，工所以备器械，非治国之本务也。

大夫曰：《管子》云：“国有沃野之饶而民不足于食者，器械不备也。有山海之货而民不足于财者，商工不备也。”陇、蜀之丹漆旄羽，荆、扬之皮革骨象，江南之柃梓竹箭，燕、齐之鱼盐旃裘，兖、豫之漆丝绪纆，养生送终之具也，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故圣人作为舟楫之用，以通川

场统一解决各方面的需求，招徕百姓，汇集各种物资、农民、商人、工匠、民众、徒众都分别得到所想要的东西，交易后离去。《易经》上说：‘物资流通而交换，使人民不会懈怠。’因此，手工业不发展，农业就缺乏工具；商业不发展，宝贵的货物就会断绝。农业工具缺乏，那么粮食就不能增产；宝贵的货物断绝，那么财富费用就要匮乏。因此，盐铁官营和均输法是用来疏通积压的物资而调节需要的缓急的，废除这些政策是不利的。”

文学说：“用德来劝导人民，那么人民就会变得淳厚；用财利来引诱人民，那么风俗就会变得轻薄。风俗轻薄，就会违背仁义而追求财利，追求财利，就会使百姓奔走于道路而聚集于市场。《老子》上说：‘贫穷的国家看似财富有余，其实并不是财富多，而是人民贪欲多而急于求利。’因此，古代圣明的君王尊崇农业，而抑制工商业，用礼义防止人民的贪欲，要充实市场上的粮食财货。市场上商人不卖无用的东西，工匠不生产无用的器物。因此，商业只用来使积压的物资流通，手工业只用来供应器物工具，它们都不是治理国家的根本事业。”

大夫说：“《管子》上说：‘国家拥有肥沃富饶的土地而人民却吃不饱，是因为生产工具不完备；拥有山、海资源而人民却没有足够的钱财，是因为工商业不发达。’陇、蜀两地的丹砂、漆器、牦牛尾和鸟羽，荆州、扬州的皮革、兽骨和象牙，江南的楠木、梓木、大竹和箭竹，燕、齐两地的鱼、盐、毛毡和皮袄，兖州、豫州的漆器、丝绸、葛布和麻布，都是养生送死的必需品，它们都要靠商业才能流通，靠手工业才能制成。因此古代

谷，服牛驾马，以达陵陆；致远穷深，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是以先帝建铁官以赡农用，开均输以足民财；盐、铁、均输，万民所戴仰而取给者，罢之，不便也。

文学曰：国有沃野之饶而民不足于食者，工商盛而本业荒也；有山海之货而民不足于财者，不务民用而淫巧众也。故川原不能实漏卮，山海不能赡溪壑。是以盘庚革居，舜藏黄金，高帝禁商贾不得仕宦，所以遏贪鄙之俗而醇至诚之风也。排困市井，防塞利门，而民犹为非也，况上之为利乎？《传》曰：“诸侯好利则大夫鄙，大夫鄙则士贪，士贪则庶人盗。”是开利孔为民罪梯也。

大夫曰：往者郡国诸侯各以其方物贡输，往来烦杂，物多苦恶，或不偿其费。故郡国置输官以相给运，而使远方之贡，故曰均输。开委府于京师，以笼货物。贱即买，贵则卖。是以县官不失实，商贾无所贸利，故曰平准。平准则民不失取，均输则民齐劳逸。故平准、均输所以平万物而便百姓，非开利孔为民罪梯者也。

圣人发明舟船桨楫以沟通水路运输，使用牛马以进行陆路运输；到达边远的区域，深入偏僻的内地，为的是交流万物而便利百姓。因此武帝设立铁官来供应农具，开办均输来增加人民的财富，盐铁官营、均输法是广大老百姓拥护并赖以取得物资供应的政策，废除它们是不利的。”

文学说：“国家拥有肥沃富饶的土地而人民却吃不饱，是因为工商业兴盛而农业荒废；拥有山、海资源而人民却没有足够的钱财，是因为不致力于生产百姓所需的物品而制造了许多华丽奇巧的东西。因此，有河川那样多的水，也装不满有洞的酒器；有山、海那样多的东西，也填不满溪谷沟壑。所以商王盘庚迁移都城，舜将黄金藏到深山，高帝禁止商人做官，为的是遏止贪鄙的习俗而培养至诚的风尚。即使排斥、困辱商人，堵塞求利的门路，而仍然有人为非作歹，何况上面在提倡求利呢！《春秋·公羊传》上说：‘诸侯好利，大夫就鄙陋；大夫鄙陋，士人就贪婪；士人贪婪，老百姓就要偷盗了。’盐铁官营打开了牟利的门路，为人民设下了犯罪的阶梯。”

大夫说：“以前，郡国诸侯各自以本地的特产进贡，往来麻烦，东西多数都变坏了，有的贡品的价值还抵不过运费。因此在郡国设置输官以负责往来运输，便于从远方进贡，这就叫作‘均输’。在京城建立仓库，用来收集货物，市价低时就买进，市价高时就售出。于是官府控制了实物，商人不能牟利，这就叫作‘平准’。有了平准，人民对自己的职责就不懈怠；有了均输，人民就劳逸均匀。因此平准和均输是为了平抑物价而便利人民，并非打开牟利之门而为人民设下犯罪的阶

梯。”

文学说：“古代向人民征收赋税，是根据他们所长，不征收他们不擅于生产的东西。农民交纳农产品，妇女交纳纺织品。现在却舍弃他们的产品，而强求他们所不能生产的东西，致使他们贱卖自己的货物，以便买进官府所需要的东西来上交。

“近来，有的地方官府命令老百姓生产布絮，官吏肆意刁难，强行收购。他们所收进的，不仅是齐、陶两地的丝绸，蜀、汉两地的麻布，也有一般老百姓所生产的此类东西。官吏奸恶，用低价收购，使农民双倍受苦，妇女双倍纳税，我们看不到均输有什么均！官府还滥发命令，关起城门而垄断市场，将所有的物品一并收购。所有的物品一并收购，物价就猛烈上涨；物价猛烈上涨，商人就从中牟利。官府自己经商，官吏就会和奸商、豪绅勾结。富商趁机屯积居奇，以待市场急需时高价出售。不法商人和奸吏贱买贵卖，我们看不到平准有什么平！古代的均输是用来平均劳逸和便利运输贡品的，并不是为了财利而收购一切货物。”

力耕第二

大夫曰：王者塞天财，禁关市，执准守时，以轻重御民。丰年岁登，则储积以备乏绝；凶年恶岁，则行币物；流有余而调不足也。昔禹水汤旱，百姓匮乏，或相假以接衣食。禹以历山之金，汤以庄山

大夫说：“君王应当封禁自然资源，管制关卡集市，掌握平衡物价的权力，抓住时机，用轻重之策统治百姓。丰收之年，就储存积蓄物资以备匮乏时使用；灾荒之年，就发放货币和物资，使积存的钱物流通来周济不足。从前，夏禹时发生水灾，商汤时发生旱灾，百姓贫困，有人靠借贷来维持生活。夏禹用

之铜，铸币以赈其民，而天下称仁。往者财用不足，战士或不得禄，而山东被灾，齐、赵大饥，赖均输之蓄，仓廩之积，战士以奉，饥民以赈。故均输之物，府库之财，非所以费万民而专奉兵师之用，亦所以赈困乏而备水旱之灾也。

文学曰：古者，十一而税，泽梁以时入而无禁。黎民咸被南亩而不失其务。故三年耕而余一年之蓄，九年耕有三年之蓄。此禹、汤所以备水旱而安百姓也。草莱不辟，田畴不治，虽擅山海之财，通百末之利，犹不能赡也。是以古者尚力务本而种树繁，躬耕趁时而衣食足，虽累凶年而人不病也。故衣食者民之本，稼穡者民之务也，二者修，则国富而民安也。《诗》云：“百室盈止，妇子宁止”也。

大夫曰：圣贤治家非一宝，富国非一道。昔管仲以权谲霸，而纪氏以强本亡。使治家养生必于农，则舜不甄陶而伊尹不为庖。故善为国者，天下之下我高，天下之轻我重。以末易其本，以虚易其实。今山泽之财，均输之藏，所以御轻重而役诸侯也。汝、汉之金，纤微之贡，所以诱外国而

历山的金，商汤用庄山的铜，铸造钱币来救济百姓，天下人都说这是仁的行为。过去，国家的物资不能满足需要，有些军队得不到俸禄，而崤山以东又遭了灾，齐、赵两地发生严重饥荒，然而，依赖施行均输法所带来的积蓄和国家仓库的粮食，军队得到了给养，饥饿的百姓得到了赈济。所以，施行的均输法所积存的物资和国家仓库中的财富，并不是从百姓那里收来专门供应军队开销，也用来救济贫困，防备水灾和旱灾。”

文学说：“在古代，交纳十分之一的赋税，按时节到湖泊鱼塘捕鱼而国家并不禁止，百姓全都在田地里劳动而不荒废农事。所以，耕作三年就多一年的存粮，耕作九年就多三年的存粮。这是夏禹和商汤用来防备水旱灾害而使百姓安居乐业的方法。如果荒地不开辟，农田不耕种，即使掌握山海的资财，开通各种取利的途径，还是不能使国家富足。所以，古时候人们注重加强农业而多种庄稼，耕作紧随时节而丰衣足食，即使灾荒连年，人们也不害怕。穿衣吃饭是老百姓的根本，耕种粮食是老百姓的要务，这两方面做好了，那么国家就富裕，人民就安宁。正如《诗经》所说：‘家家户户富足，妇女小孩安宁。’”

大夫说：“圣贤之人治家的妙法不只一个，使国家富裕的途径不只一种。从前，管仲用权术和诡诈的方法使齐桓公成就霸业，而纪氏却由于大搞农业而亡国。如果为了一家的生活必须从事农业，那么舜就不应去制作陶器，伊尹就不应去做厨师。所以，善于治国的人，尊贵天下人认为卑贱的事物，重视天下人轻视的事物。用工商业产品换来农产品，用虚的东西换来实的东西。现在，从山林川泽取得的财富，通过均输法而获的积

钧胡、羌之宝也。夫中国一端之缣，得匈奴累金之物，而损敌国之用。是以驛驴駝，銜尾入塞，驛驛驛马，尽为我畜，驛驛狐貉，采旂文罽，充于内府，而璧玉珊瑚琉璃，咸为国之宝。是则外国之物内流，而利不外泄也。异物内流则国用饶，利不外泄则民用给矣。《诗》曰：“百室盈止，妇子宁止。”

文学曰：古者，商通物而不豫，工致牢而不伪，故君子耕稼田鱼，其实一也。商则长诈，工则饰伪，内怀阉阉而心不忤，是以薄夫欺而敦夫厚。昔桀女乐充宫室，文绣衣裳，故伊尹高逝游薄，而女乐终废其国。今驛驴之用，不中牛马之功，驛驛旂罽，不益绵绵之实。美玉珊瑚出于昆山，珠玕犀象出于桂林，此距汉万余里。计耕桑之功，资财之费，是一物而售百倍其价一也，一揖而中万钟之粟也。夫上好珍怪，则淫服下流，贵远方之物，则财货外充。是以王者不珍无用以节其民，不爱奇货以富其国。故理民之道，在于节用尚本，分土井田而已。

蓄，都用来推行轻重之法以役使诸侯。汝、汉地区的金子，各地进贡的丝麻，可以引诱外国人和换取胡人、羌人的珍宝。用我们的两丈丝绸，可以得到匈奴价值许多金子的物品，从而损耗了敌国的财富。这样，驛、驴、骆驼就会络绎不绝地进入我们的关塞，各种良马就会全都成为我们的牲畜，鼠皮、貂皮、狐貉等皮料，彩色的毛毡、花毡，就会装满我们的仓库，璧玉、珊瑚、琉璃，就会全部成为我们的宝物。这样，外国的东西流入了我国，而我国的财物却不外流。外国的东西流入我国，国家就富有，自己的财物不外流，就能供给百姓的需求了。这才如《诗经》所说：“家家户户富足，妇子小孩安宁。”

文学说：“古时候，商人流通货物而不欺诈，工匠制造坚牢的器物而不作假，所以，君子无论从事农业耕种还是打猎、捕鱼，都一样勤劳诚实。现在，商人则擅长欺诈，工匠则作假，内心怀着非分之想而不感到惭愧，致使刻薄的人变得欺诈，敦厚的人变得刻薄。从前，夏桀用美女歌舞充斥宫室，衣着华贵，所以伊尹离开他，远游到商都亳，而美女歌舞最终使夏桀亡了国。如今，外来的驛驴的用处比不上我们的牛马，鼠皮、貂皮、彩毡、花毡，也比不上我们的锦缎丝绸。美玉、珊瑚出产在昆山，珍珠、犀角、象牙出产在桂林，这些地方离汉朝有一万多里。用种田养蚕的收获来计算购买这些物品的费用，那么一件物品要换取百倍的代价，一捧东西要值万钟谷子。朝廷喜好珍奇，那么下面就会有奢侈的风习；朝廷以远方的东西为贵，那么财物就会外流。所以帝王不珍爱那些没有用的东西，以使百姓节俭；不喜好那些稀奇的东西，以使国家富裕。所以治理百姓的方法，

大夫曰：自京师东西南北，历山川，经郡国，诸殷富大都，无非街衢五通，商贾之所臻，万物之所殖者。故圣人因天时，智者因地利，上士取诸人，中士劳其形。长沮、桀溺，无百金之积，跖蹻之徒，无猗顿之富，宛、周、齐、鲁，商遍天下。故乃商贾之富，或累万金，迫利乘美之所致也。富国何必用本农，足民何必井田也？

文学曰：洪水滔天，而有禹之绩，河水泛滥，而有宣房之功。商纣暴虐，而有孟津之谋，天下烦扰，而有乘美之富。夫上古至治，民朴而贵本，安愉而寡求。当此之时，道路罕行，市朝生草。故耕不强，无以充虚，织不强，无以掩形。虽有湊会之要，陶、宛之术，无所施其巧。自古及今，不施而得报，不劳而有功者，未之有也。

只在于节俭重农，分地实行井田制罢了。”

大夫说：“从京城向东西南北四方，经过高山、大河和各郡、各封国，所有繁华富庶的城市，无不是道路四通八达，商人云集，各种货物汇聚。因此，圣人顺应天时，智者顺应地利，聪明的人从别人那里取得财富，不聪明的人靠自己的体力劳动。长沮、桀溺不会有百金的积蓄，盗跖、庄蹻不能像猗顿那样富有。宛、周、齐、鲁等地，商人遍及天下。所以商人很富，有的财产多达数万金，这是追求财利获取盈余的结果。因此，使国家富足为什么一定要以农为本？使百姓富足为什么一定要用井田制呢？”

文学说：“由于发生了严重的洪灾，才有大禹治水的功绩；由于黄河泛滥，才有宣房宫的修建；由于商纣王凶暴残酷，才使周武王与诸侯在孟津共谋讨伐；由于天下混乱，商人才乘机取利致富。在远古时代，天下治理得最好，百姓淳朴而重农，安定欢愉而没有什么要求。当时，路上很少有行人，公众聚会的地方生出了荒草。在那种情况下，不努力种田的人就没有办法吃饱，不努力纺织的人就没有衣服穿。即使有把各种货物集中起来的妙法，有用土烧造房子的本事，也没有地方施展这些技巧。从古到今，不付出而得到报答，不劳动而有收获，这样的事情是不存在的。”

通有第三

大夫曰：燕之涿、蓟，赵之邯郸，魏之温、轵，韩之

大夫说：“燕地的涿、蓟，赵地的邯郸，魏地的温、轵，韩地的荥阳，齐地的临淄，

荥阳，齐之临淄，楚之宛丘，郑之阳翟，三川之两周，富冠海内，皆为天下名都。非有助之耕其野而田其地者也，居五都之冲，跨街衢之路也。故物丰者民衍，宅近市者家富。富在术数，不在劳身；利在势居，不在力耕也。

文学曰：荆、扬南有桂林之饶，内有江湖之利，左陵阳之金，右蜀、汉之材，伐木而树谷，燔莱而播粟，火耕而水耨，地广而饶财；然民黠窳偷生，好衣甘食，虽白屋草庐，歌讴鼓琴，日给月单，朝歌暮戚。赵、中山带大河，纂四通神衢，当天下之蹊，商贾错于路，诸侯交于道；然民淫好末，侈靡而不务本，田畴不修，男女矜饰，家无斗筰，鸣琴在室。是以楚、赵之民，均贫而寡富。宋、卫、韩、梁好本稼穡，编户齐民，无不家衍人给。故利在自惜，不在势居街衢；富在俭力趣时，不在岁月翫也。

大夫曰：五行，东方木，而丹、章有金铜之山；南方火，而交趾有大海之川；西方金，而蜀、陇有名材之林；北

楚地的宛丘，郑地的阳翟，处在伊水、洛水和黄河之滨的洛阳和巩县，它门在全国最富裕，都是天下闻名的都城。这些地方富裕，并不是靠耕种田地，而是由于位在五大诸侯必经的大道上，占据了交通要冲。因此，物资丰饶的地方百姓富足，住处靠近市场的人家有钱。要富裕，在于用方法和谋算，而不在于进行体力劳动；要获利，在于处在好的位置，而不在于努力耕作。”

文学说：“荆州、扬州南有富庶的桂林，内有江河湖泊的水产，东有陵阳的铜矿，西有蜀郡、汉中的木材，伐掉树木就可以种植庄稼，烧掉野草就可以播种，采用火耕水耨的方法耕作，土地广阔而物产丰富。然而那些地方的人非常懒惰，好穿贪吃，尽管住在简陋的茅草房，却唱歌弹琴，饭食能供给一天，供给不了一个月，早上歌唱，晚上忧愁。赵地、中山有黄河横贯，汇合了四方交通要冲，处在天下人所经的路线上。商人在道上频繁来往，诸侯在道上交错而过。然而那里的百姓淫邪腐化，喜好工商业，奢侈浪费而不重农，不照料田地，男女讲究打扮，家中没有存粮，却还在屋里弹琴作乐。因此楚赵两地的百姓都贫穷，富裕的很少。宋、卫、韩、梁等地的人重视农业，努力耕作，户籍簿上的平民，无不是家富人足。因此，得利在于爱惜自己不去干下贱的事情，而不在于身居街市和交通发达的地方；富裕在于俭省劳力和按时耕种，而不在于每年派官吏征收赋税。”

大夫说：“根据五行学说，东方属木，而丹阳、章山有蕴藏着金铜的矿山；南方属火，而交趾有大海大河；西方属金，而蜀、陇有生长着名贵木材的森林；北方属水，而幽州